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学考察

周 辉^{1a}, 张红春^{1b}, 张明志², 文学平³, 张 力^{1a}

(1. 重庆大学 a. 动力工程学院; b. 党委学生工作部, 重庆 400044; 2.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7;
3.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以及受教育后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模式等必须努力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符合既定的教育要求, 此种符合要求和达到目标的程度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依从、认同、内化是其有效性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增强教育源的可信性、提高教育方式的影响力、注重受教育者的特点是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达到更高层次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 接受度; 社会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2)04-0151-06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1],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有效性”作为主客关系范畴, 是指“特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所具有的相应特性, 且这种特性又是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在与相应价值主体构成的价值关系, 即对相应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中得以表现。离开了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特定属性, 有效性便没有了确立的根基; 离开了特定的价值关系, 有效性也同样无从谈起”^[2]。据此,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以及受教育后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模式等必须努力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符合既定的教育要求, 此种符合要求和达到目标的程度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有效性的层次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结果满足特定教育要求的程度, 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1) 受教育者依从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 并按其要求施之于行为; (2) 受教育者认同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3) 受教育者内化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为自己的意志和信念, 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朝着与教育者所引导、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变化, 并在行为上能自觉实践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持久地运用符合特定要求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划分的依据在

收稿日期: 2011-12-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辅导员骨干专项“高校辅导员胜任力评价模式研究”(2009ZH15)

作者简介: 周辉(1974-), 男, 重庆忠县人, 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院讲师, 法学硕士, 主要从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于社会心理学的定则之一,即“人们对社会影响的反应分为三类:依从、认同、内化”^[3]。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社会对受教育者系统地施加影响的过程,其有效性也恰是人们对这种教育影响的反应。依从(compliance)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其特点是,行为持续的时间与奖励或惩罚存在的时间相等”;认同(identification)是对教育影响的又一种反应,“做出这种反应是由于个体希望自己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将准则和信念内化(internalization)是对社会影响最持久、最根深蒂固的反应。把某种信念内化的动机源于使自己正确而不犯错误的愿望”^[3]。依从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最低体现;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较高体现;内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教育者认为,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存在很大问题也正是仅仅看到其有效性的理想状态,以内化作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唯一尺度,这就会导致难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作出真正客观的评价。但是,教育者不断向着理想状态追求,并努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这又是理所当然的。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得到增强,不断地从依从发展到认同,从认同发展到内化,关键要在三个方面下苦功夫:第一是教育者的特征(什么样的人在教育);第二是教育的方式方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教育);第三是受教育者的既有特征(被教育的对象是怎样的)。简言之,即“谁对谁怎样教育谁”。此外,教育的内容(教育者传授给被教育者什么)与其它三个方面相比,对教育有效性的影响虽然也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特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事实和价值观念)都是相对固定的,教育者本人并不能随意改变教育内容,而是必须按照既定的内容进行教育,所以单个教育者可以把教育内容当作常量,而将其它三个方面当作变量,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必须在变量上有所改进和创新。

二、教育者的特征与信服度

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发出者,教育活动的组织者,教育过程的操纵者以及活动后果的监控者。教育者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导者,作为教育对象的受教育者虽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但不是主导者,而是受引导者、被主导者,所以教育者的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影响十分巨大。教育者的如下五个方面特征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程度:(1)品性;(2)知识;(3)外部特征;(4)阅历;(5)地位。

思想政治教育要影响人,从而产生预期的实际

效果,就必须说服人,因此它也是一种说服人的艺术,为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找到说服人的方式。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讲究修辞术,即“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4]。第一位有著作流传于世的社会心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当演说者的话令人相信的时候,他是凭他的性格来说服人,因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一般都更相信好人,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对于那些不精确的、可疑的演说,也完全相信。……认为演说者的善良品质无补于他的说服力,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其实演说者的性格可以说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的时候,演说者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产生说服的效力,因为我们在忧愁或愉快、友爱或憎恨的时候所下的判断是不同的。”^[4]显然,亚氏针对“演说者”所讲的内容,完全适合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为二者的直接目的都是说服,即让自己的听众或受教育者信服自己。亚氏所说的“性格”也就是善良性格,即良好的道德品质,受教育者因认同、赞许或仰慕教育者的“品性”,进而扩展为对教育者发出的教育信息也天然地倾向于接受、认同、赞成或支持,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光环效应”,即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刻板印象之后,就自然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因此,性格上有较大缺陷的人,尤其是道德品质上有缺陷的人,并不适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就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服度而言,不但教育者的性格或品德非常重要,教育者的知识水平也很重要。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人知识渊博,那么他所提出或传播的教育信息也就更为可信,因为人类是认知的吝啬鬼(cognitive misers)。单个人的精力总是十分有限的,而有待人类认识的事物又是无限的,同一事物有待认识的方面和程度也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总是倾向于遵循“费力最小”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人们尽可能地以最少的精力认知最多的事物,这也符合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5]。据此,受教育者在获得同等可靠程度的认知方面,总是尽力节省自己认知上的精力,相信品性优良而又知识渊博的人所发出的教育信息,正好可以极大地节省人们的认知成本。于是受教育者总是无意识地进行如下推理。

- (1) 因为教育者 A 品性优良。
- (2) 所以 A 不会故意撒谎骗人。
- (3) 因为 A 知识渊博。
- (4) 所以 A 决非平庸无知,而是有真知灼见。

(5)因此,信服A所传递的教育信息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6)所以我信服A所传递的信息,以免对复杂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思考和探究。

如果教育者的品性不好,即使他传递的教育信息正确无误,受教育者也可能怀疑他是在撒谎或为了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故意那样讲,因而拒绝相信他所传递的信息;如果受教育者相信教育者的品性优良,但才疏学浅,受教育者也不会轻易相信教育者所传递的信息。

求知是人的本性,人们更容易认可知识渊博的教育者,但爱美同样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们更容易认可外貌特征较好的教育者所提供的教育信息。以貌取人虽然有失妥当,但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教育者如果具有受教育者认可甚至羡慕的外部特征,那么其教育效果可能远好于外部特征令人生厌的教育者。受教育者潜意识中的逻辑是:人如其面,才入其貌。其实这就是“社会刻板印象”^[6]在教育中的反应。

知识在根本上源自人们的生活实践,实践则需要时间;从书本上获得的间接知识总是没有亲身经历那么真切,这就是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切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在生活实践、亲身躬行、耳闻目见等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社会学家称之为“阅历”。阅历越是丰富,他对知识的理解往往就越深刻,他的话语也就越显得可信。比如:一个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小青年,一个是饱经生活风霜的长者,二人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哪个人的话更容易让人信服呢?显然老者的话不但传达了与年轻人相同的“语意”,更是通过此语意传达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真谛。可见,教育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说服力。

求知是人的本性,崇拜权威也是普遍的心理现象,其原因有三:第一,从众心理。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完全是因为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相信他的话,否则他就不是权威或成不了权威,而相信权威、服从权威可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避免由于不相信权威而带来的社会心理压力,避免遭到相信权威者们的异样目光。第二,害怕错误心理。每个人都不想犯错误,甚至惧怕错误,力求正确。人们普遍认为“专家比普通人更有可能正确”,因此为了避免错误,人们通常选择相信权威。第三,博得认可心理。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否则,自我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因为任何“自我”都是通过“他我”而

被建构的。相比之下,同样数量的普通人的认可与同样数量的权威的认可,人们更加注重权威的认可,这也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自我感觉”,更加有利于认可自己的“重要性”。可以认为,崇拜权威实际上是崇拜在某一方面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社会是阶梯,有许多等级存在,就但个人而言,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其话语更有影响力。

三、教育方式与接受度

同样的信息观念,因为传递方式的不同,其效果也各异。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达方式对教育效果的影响显而易见。不同的传递方式决定着教育信息被受教育者接受的程度,以下六个方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

(一)感性方式与理性方式

感性的教育方式是通过将教育者的情感好恶、喜怒哀乐、理想愿望等情感意志因素传递给受教育者,以情感意志包裹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教育信息,从而达到以情感人的教育目的;理性教育的方式是借助逻辑推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达成教育目标的思想教育方式。感性教育方式关键在于唤起受教育者的情感意志力,而理性教育方式关键在于唤起受教育者的逻辑推理能力和鉴别事实真伪的能力。究竟哪种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更为有效呢?笔者以为,感性教育方式更为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的在于传递政治情感和价值观念,历史事实或科学事实只是当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特定的情感和价值观念时才有必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价值和情感难以仅仅依靠逻辑推理就能深入人心。事实上,不同性质的学科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数学教育就不可能依靠感性的教育方式,因为数学本身就是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情感和价值观念的教育,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感性教育方式则更为有效。当然,笔者并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需要采取说理性的教育方式,而是与抽象的理论论证和逻辑推理相比较,感性教育的方式更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更能增强其教育有效性。近年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普遍采用多媒体教学,其实质正是运用图片、视频等形式多样的感性材料,达到为情感教育服务的目的。

(二)个人经验与普遍数据

个人经验即教育者通过耳闻目见或亲自实践而获得的感受、印象、体验、感悟或反思;普遍数据是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和调查分析而得出的科学定理或统计结论。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受教育者究竟是

更容易接受个人经验呢,还是更容易接受普遍数据?笔者的答案是个人经验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更为有效。个人经验生动形象、直观具体,并包含了教育者的情感、意志和追求等个性化的因素,而普遍数据往往显得抽象而空洞。显然,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丰富的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必然比满脑子科学数据的年轻人更好。

(三) 正面信息与双面信息

正面信息是指教育者只传递希望受教育者认同或接受的信息,而对其他信息不予提及;双面信息则指教育者既提供希望受教育者认同或接受的信息,又详实地提供其他信息。究竟哪种方式更加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呢?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假定教育者想要传递的教育信息有理有据、真实可靠,在这一前提下至少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受教育者是否对负面信息有所了解;二是受教育者的初始心态是倾向于接受正面信息,还是倾向于接受负面信息。

其一,如果受教育者对负面信息毫无了解,那么直接传递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最容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这种方式往往只适合信息封闭而受教育者难有机会接触到负面信息的情况,受教育者本没有负面的想法或负面的信息,如果教育者主动提出负面的看法,受教育者可能被负面的观点所左右。但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信息相对开放的世界,处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受教育者都有机会接触各种负面信息,即使受教育者当前还没有接触到负面信息,但一旦接触就可能使之前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全面崩溃。“五天的学校教育,赶不上两天的社会影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二,如果受教育者对负面信息已有所了解,而基本倾向于接受正面信息,那么主要宣讲正面信息,略微提及负面观点,并加以反驳,这样最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果只是宣讲正面观点,受教育者就可能认为教育者要么孤陋寡闻,要么不够客观公正,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其三,如果受教育者对负面信息有较多了解,且受到负面信息的较多影响,那么,先宣讲论证正面信息,再提供负面信息,并对负面信息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或驳斥,这将最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如果教育者仍一味地只是宣讲正面信息,给受教育者造成的感觉就可能是:教育者故意隐瞒某些真相,而灌输给受教育者一些未必立得住脚的思想观念。如果受教育者产生了这种感觉,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信息社会使得正

面和负面的观念同时纷至沓来,单一的正面宣讲已经力不从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研究各种负面信息,并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或驳斥,方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 教育者的观念与受教育者原初观念之间的差异程度

教育者所要传递的观念与受教育者原初观念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二者的观念高度一致,那么教育就不复存在;如果二者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那么教育也就失去太大意义;如果二者差异巨大,那么教育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显然,前两种情况谈不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观念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之前笔者简单分析一种普遍的心态,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观念永远正确。此观念潜在于如下推理:(1)我自己具有正常的理智和认知能力,因而我所真心持有的观点别人也应认为是正确的;(2)别人反驳我的观点,这意味着他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3)别人的观点与我自己的观点之间,差别越大或他人反驳得越厉害,我感到越不舒服。显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观点差异越大,受教育者感到越不舒服。这是否意味着受教育者越不舒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越差呢?教育者是否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受教育者的观点呢?绝对不是。

受教育者消除观点差异所带来的不舒服感至少有四种方式:(1)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而尽力与教育者的观点保持一致;(2)寻求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同盟者,在心理上获得支持,从而保持自己原初的观点不变,将教育者的观点视为废话而不予理睬;(3)与教育者进行观点上的交锋,并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者,从而使教育者赞同自己的观点;(4)通过观点上的交锋,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各自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不过受教育者将教育者视为蠢蛋或别有用心者,从而使得教育者的观点对受教育者归于无效。客观地说,这四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在开放式的自由讨论中,情况(2)发生的机率大,而在灌输式教育和师生对辩中,情况(1)(3)(4)皆有可能发生。在通常情况下,由于教师的地位角色和知识水平皆优于受教育者,所以情况(3)(4)发生的机率较小,而情况(1)发生的机率最大,但必须建立在教育者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害怕观点间的差异,差异越大,对受教育者影响将越大,只要教育者能做到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那么观点差异越大,受教育者越容易真正接受教育者的观点。

(五)利益无涉与利益相关

如果教育者说服别人相信某种观点,而自己并不会从中获得任何利益,那么其观点容易被别人相信;如果受教育者是否接受教育者的观点,与教育者的利益直接相关,那么受教育者则较难真心接受教育者的观点。其心理过程可以归纳如下:(1)在自己能够从中获利的前提下,说话者 A 最有可能说慌;(2)如果 A 要传递的信息无论真假,A 都不会获益或受损,那么 A 缺乏说谎的理由,因此,A 的话极有可能为真;(3)在没发现 A 的话为假的充足理由之前,应该相信 A。

(六)故意传递的信息与无意传递的信息

心理学研究确证了这样的原则:“如果听众绝对肯定某人无意影响他们,此人的可信性同样也会增加。”^[3]此原则有效的原因在于人们通常会有如下心理推测:(1)人们为了自己获得某种益处才会刻意说服别人;(2)说话者 S 并没有刻意要说服我;(3)S 不会通过他的话语从我这里获益;(4)S 的话极有可能值得信赖。而故意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远不如无意间传递的信息那么有效,因为受教者可能假定:故意传递的信息背后可能隐藏着别样的目的,而不一定是为了真理本身。

四、受教育者的特征与受影响度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符合莱布尼茨的差异律。但事实上可以根据某些因素对受教育者进行划分,并认为存在具有一定共同点的类,这样会大大简化教育者对问题的思考。前面谈到,从是否了解负面信息和受教育者的初始态度两个因素对受教育者的划分,并看到了两个因素在决定双面信息是否比正面信息更有效的问题上起主导作用。为了寻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笔者将进一步从受教育者的自尊心、自由度、诉说偏见等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受教育者的自尊心

受教育者的个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有何影响?与有效性最密切相关的个性因素是自尊感。因此,可以把问题简化成:受教育者的自尊感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有何影响?每个人都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为更低等的野兽,也能找你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7]。自尊是人的基本要求,被尊重也是人的基本权利。简言之,自尊心是自己尊重自己、自己认可自己、自己悦纳自己的自我认知状态和情感体验。自尊心,人皆有之,但有的人

自尊心较强,有的则自尊心较弱。自尊心强的人更加倾向于坚持自己原有的观念,而难以接受劝导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自尊心强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较为严格,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度也较高,并认为自己的观念持之有故,并不是非理性的自我偏见,更不会认为自己由于认识能力低下而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因此,更容易坚守自己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念。自尊心较弱的人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度不太高,对自己在观念上正确程度的自信也相对较弱,因此更容易受他人观点左右,放弃自己原有的观念,而自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观念。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对自尊心较弱的人正面宣讲较为有效,而对自尊心较强的人则要采取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受教育者都必须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维护他们的尊严,如果受教育者感到自己被轻视、被贬低或被侮辱,那么无论教育内容的真理性多么强,无论教育方式多么新奇,都决不会有好的教育效果,因为“尊严和自尊齐进共退,我们得到的尊严滋养了我们的自尊,而自尊则会使他人尊重我们”^[8]。维护受教育者的尊严和自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予恰如其分的认可。因为,“认可之于身份就像食物之于身体,是不可或缺的。认可肯定了我们的身份,确认了我们的尊严,从而保证我们在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是安全的。……个人得不到认可,就会自我怀疑,集团中部分人群得不到认可,就会被边缘化,沦为受欺压的对象”^[8]。

(二)受教育者的自由度

“生命曾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二者皆可抛”。自由与自尊一样,都是人的基本需要。在任何历史时期,监禁都是作为惩罚而存在的,监禁永远不会是一种奖赏,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显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尊重和呵护受教育者的自由需要。当然,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受一定的社会压力,但这种社会压力如果明显地使受教育者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时,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受到威胁时,任何人的直接反应都是力图消除威胁,并采取与教育者要求相反的抵抗行动,至少是显示出一种敌对的抗拒情绪。因此,真正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决不能是诉诸外在或心理的强制,当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体验到轻松愉快的自由感时,教育的效果才能达到最佳。

(三)受教育者的诉说偏见

每个受教育者由于知识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先

前所受教育、思维方式等等不同,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其中有些偏见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可能相抵触。对这样的偏见,教育者很难用正面论证直接说服受教育者放弃偏见,因为偏见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而且被用于对许多现象的解释,如果偏见持有者在教育者的影响下,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先前的偏见,那就等于他很轻松地就承认了自己长期以来把错误当作了正确,并广泛运用这一偏见,这就意味着自己在理智上容易受骗。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轻松承认自己在理智上的不成熟,容易受错误观念长期支配。否则,自尊心和自我认同感会受到损害。任何人要消除长期形成的偏见都要经历一段时间剧烈的理智和情感的搏击,因此直接正面论证和反驳很难奏效。笔者认为,教育者可以采取如下办法:第一步,让偏见的持有者 A 真诚地说出其偏见;第二步,让具有不同意见的受教育者 B 说出其不同见解;第三步,让 A 与 B 进行简短辩论;第四步,教育者指出 A 的论证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要素和理由。在第四步时,教育者不宜直接反驳 A 的偏见,而是委婉地指出其不足。这样,经过他自己的琢磨和思想斗争,才可能逐渐放弃自己的偏见,而接受教育者的观

点。如果教育者直接反驳,反而可能激发 A 的防卫心理,并为偏见虚构若干理由以加固已有的偏见。

参考文献:

- [1] 邱伟光,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
- [2] 沈壮海.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6.
- [3] 阿伦森. 社会性动物[M]. 郑日昌,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4,34-35.
- [4] 亚里斯多德. 修辞学[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 [5]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0-104.
- [6] 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92-195.
- [7] 皮科·米兰多拉. 论人的尊严[M]. 顾超一,樊虹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 [8] 罗伯特·W·福勒. 尊严的提升[M]. 张关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

A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ZHOU Hui^{1a}, ZHANG Hongchun^{1b}, ZHANG Mingzhi², WEN Xueping³, ZHANG Li^{1a}

(1. a. School of Power Engineering; b.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P. R. China;

3.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factual quality of a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rds with determined ends and satisfies with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are three levels of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redibility of educational sources, advancing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mean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characters of the educated are the main method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effectiveness; persuasion; acceptability; influence

(责任编辑 彭建国)